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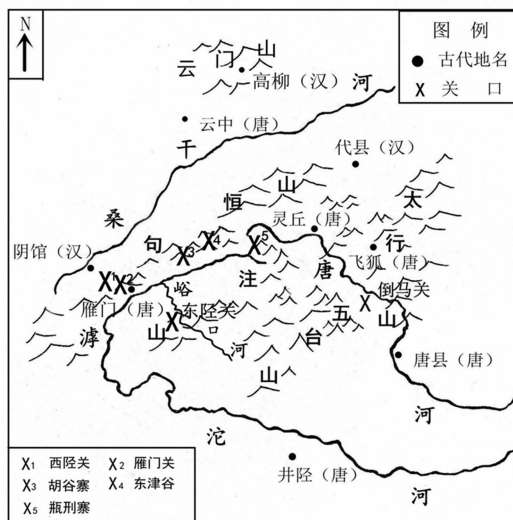
# “雁门关东陉说”辨误及相关问题\*

续 楠 王 海

**提 要：**“雁门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始见史乘，置于“句注”“陉岭”之上，与文献中之“西陉”相应，位于今山西代县雁门关镇白草口村。今代县雁门关镇雁门关村，乃明代以降“雁门关”所在，不少学者认为唐代“东陉关”为其前身，或称“雁门关东陉说”。《通典》云：“雁门郡南三十里有东陉关。”由句注“山形勾转”的自然地理形势，安史之乱时郭子仪“开东陉”的军事交通地理来考量，杜佑的记述无误，《中国历史地图集》标定的唐“东陉关”很可能位于今代县东南峪口乡，“雁门关东陉说”或可商榷。

**关键词：**雁门关 句注 东陉关

雁门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化地理坐标之一。先秦时期的雁门应指地处高柳（今大同阳高县以北）一带的雁门山。今朔州南、忻州北的雁门山，先秦时期称为“句注（山）”，已建有长城关隘，是闻名天下的“九塞”之一。魏晋南北朝时期，句注山有“陉岭”之称，分置“东陉”“西陉”，“雁门关”始见于文献记载而设于“西陉”（今代县雁门关镇白草口村）。隋唐时期，“东陉关”“西陉关”见诸史乘。宋代，“西陉关”或称“西陉寨”，于其东置“雁门寨”“胡谷寨”。明代以降，雁门关徙置今代县雁门关镇雁门关村，不少学者认为其前身乃唐代之“东陉关”，或称为“雁门关东陉说”。然而，《通典》明言“（雁门）郡南三十里有东陉关”<sup>①</sup>，唐代雁门郡治今代县，东陉关地处其南“三十里”，与今代县以北的雁门关方位不同。杜佑所云乃当朝人说当朝事，又可得到自然地理、军事交通地理方面的佐证，故而“雁门关东陉说”似并不足据。



“句注”一带山川形势示意图<sup>②</sup>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生态环境史视野下的秦汉‘北边’社会研究”（项目编号：16CZS024）阶段成果。

① 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179《州郡九》，中华书局，1988年，第4741页。

② 本图据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5册《隋·唐·五代十国时期》“唐·河东道”图（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改绘而成。

## 一 雁门关东陉说

雁门一名，最早见于先秦文献。《尔雅·释地》记载：“北陵西隩，雁门是也。”郭璞注曰：“即雁门山也。”<sup>①</sup>《山海经·海内西经》曰：“雁门山，雁出其间。在高柳北。高柳在代北。”<sup>②</sup>《中国历史地图集》中，高柳位于今山西大同阳高县以北。<sup>③</sup>先秦典籍中的雁门应是位于今山西大同一带的雁门山。

汉时，亦见“雁门阻险”“雁门塞”的记载。汉廷“治雁门阻险”<sup>④</sup>之前，程不识曾屯兵雁门郡，后更有大规模的雁门马邑伏击战。<sup>⑤</sup>伏击计划落空后，汉边防压力大增。《史记·匈奴列传》曰：“自是之后，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往往入盗于汉边，不可胜数。”<sup>⑥</sup>在此背景下，“治雁门阻险”可能指完善加强雁门郡最外侧的防御工事。然而，“雁门阻险”或许并不一定相当于“句注”。《吕氏春秋·有始》载：“何谓九塞？大汾，冥阨，荆阮，方城，殽，井陉，令疵，句注，居庸。”高诱注：“险阻曰塞。”<sup>⑦</sup>《说文·土部》：“塞，隔也。”<sup>⑧</sup>句注位于今朔州以南、忻州以北，属于秦汉雁门郡南境，是中原政权最重要的塞防之一。秦末汉初，匈奴强大，不时南下“寇掠”汉朝，匈奴“逾句注”<sup>⑨</sup>、汉军“屯句注”<sup>⑩</sup>等军事行动多见于史书记载。但“句注塞”应该不会为此“雁门阻险”的全部或最重要组成部分，否则雁门郡境大部将无险可守，匈奴骑兵可长驱直至句注山北。句注塞更多应为汉朝确保太原、河东等内地安全的最后一道屏障。《史记·匈奴列传》载：“自马邑军后五年之秋，汉使四将军各万骑击胡关市下”，其中“李广出雁门，为胡所败”。<sup>⑪</sup>汉军此次所出之“雁门”，所指当非句注塞，而是郡境北部之边塞，此前汉廷所“治雁门阻险”，或许在强化边防的同时，也为汉军借助长城交通的调动、集结提供了便利。<sup>⑫</sup>

至东汉后期，鲜卑在首领檀石槐的带领下“兵马甚盛”而“尽据匈奴故地”<sup>⑬</sup>，成为汉“北边”之大患。灵帝时，“幽、并、凉三州缘边诸郡无岁不被鲜卑寇抄，杀略不可胜数”<sup>⑭</sup>，熹平六年（177）汉廷有“夏育出高柳，田晏出云中，匈奴中郎将臧旻率南单于出雁门”的“三道出塞”之举。<sup>⑮</sup>汉军此次进攻的核心目标正是位于高柳北三百里弹汗山啜仇水上的檀石槐大本营。

① 郭璞注，邢昺疏，阮元校刊：《尔雅注疏》卷7，《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2615页。

② 袁珂校注：《山海经校注》，巴蜀书社，1992年，第340页。

③ 参见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1册《原始社会·夏·商·西周·春秋·战国时期》“战国·赵、中山”图，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第37—38页。

④ 《汉书》卷6《武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第164页。

⑤ 参见《汉书》卷6《武帝纪》，第160—162页。

⑥ 《史记》卷110《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2905页。

⑦ 吕不韦著，陈奇猷校释：《吕氏春秋新校释》卷13《有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63、667页。

⑧ 许慎撰，段玉裁注，许惟贤整理：《说文解字注》卷13下《土部》，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1198页。

⑨ 参见《汉书》卷94《匈奴传》，第3753页。

⑩ 参见《史记》卷110《匈奴列传》，第2904页。

⑪ 参见《史记》卷110《匈奴列传》，第2906页。

⑫ 参见王子今：《秦汉长城与北边交通》，《历史研究》1988年第6期。

⑬ 参见《后汉书》卷90《乌桓鲜卑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2989页。

⑭ 参见《后汉书》卷90《乌桓鲜卑列传》，第2990页。

⑮ 参见《后汉书》卷90《乌桓鲜卑列传》，第2993页；裴松之注引《魏书》曰：“匈奴中郎将臧旻与南单于出雁门塞”。（《三国志·魏书》卷30《鲜卑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838页。）

故三道所出应皆为三郡之北部边塞，若以雁门郡北部之“雁门塞”当南境之“句注塞”，或有不妥。今朔州以南、忻州以北的山脉，在战国秦汉时期称“句（勾）注”，不同于当时的雁门、雁门山、雁门塞。

魏晋时期，句注山称“陁岭”。《晋书·地理志上·并州》载：“魏黄初元年，复置并州，自陁岭以北并弃之，至晋因而不改。”<sup>①</sup> 陁岭成为中原政权与北方游牧民族势力的分界线，“陁南”“陁北”成为双方活动地域的代称。西晋末年，鲜卑拓跋猗卢率部落南徙，自云中达雁门，从并州刺史刘琨求陁北地，琨“乃徙马邑、阴馆、楼烦、繁峙、崞五县之民于陁南，更立城邑，尽献其地”。<sup>②</sup>

北魏时期，“雁门关”始明确见于史乘。明元帝泰常四年（419）“幸代，至雁门关，望祀恒岳”<sup>③</sup>。“句注”“陁岭”上的关隘始有“雁门关”之称，然而北朝隋唐时期，“句注”“陁岭”上的关隘多称为“西陁（关）”“东陁（关）”“陁岭之隘”。《魏书·灵徵志下》载：“太祖天兴四年春，新兴太守上言：‘晋昌民贾相，昔年二十二，为雁门郡吏，入句注西陁。’”<sup>④</sup>《水经注》云“雁门郡北对句注，东陁其南，九塞之一也”<sup>⑤</sup>，是东陁见于记载之始。北周保定三年（563），“齐人守陁岭之隘”<sup>⑥</sup>以阻杨忠南下晋阳。《隋书·杨义臣传》云：“炀帝嗣位，汉王谅作乱并州。……义臣率马步二万，夜出西陁”<sup>⑦</sup>解代州之围。“东陁”“西陁”重要的军事战略作用，使其见于当时典制类文献中。《通典》载：“（雁门）郡（今代县）南三十里有东陁关，甚险固。”<sup>⑧</sup>《新唐书·地理志三》代州雁门郡雁门县条载：“有东陁关、西陁关。”<sup>⑨</sup>至唐后期，“句注”“陁岭”上的关隘又以雁门关之名见于记载。《新唐书·刘沔传》载：“会昌二年，（回鹘）又掠太原、振武……（刘沔）乃拜河东节度兼招抚回鹘使，进屯雁门关。虏寇云州，沔击之。”<sup>⑩</sup>《旧唐书·僖宗纪》载：“沙陀部落逾雁门关，进逼忻州。”<sup>⑪</sup>唐时，宪州（今山西娄烦）天池县亦载有“雁门关”<sup>⑫</sup>，“其关东临汾水，西倚高山，接岚、朔州”<sup>⑬</sup>。此关虽名“雁门”，然与历代建构有防御体系的代州“雁门关”实非一处。

宋辽对峙时期，宋于代州雁门县（今代县）置“西陁、胡谷、雁门三寨”<sup>⑭</sup>。太平兴国年间，“会契丹入雁门，（杨）业领麾下数千骑自西陁而出，由小陁至雁门北口，南向背击之”，大败辽军。<sup>⑮</sup>“雁门”与“西陁”异地，但同为宋辽作战前线。明代重建的“雁门关”，或始自宋代的“雁门寨”。明代，“雁门”的军事地位进一步上升。太祖十分重视“雁门关”一线的防务

① 《晋书》卷14《地理志》，中华书局，1974年，第428页。

② 《魏书》卷1《穆帝纪》，中华书局，1974年，第7页。

③ 《魏书》卷108《礼志一》，第2737页。

④ 《魏书》卷112《灵徵志下》，第2954页。

⑤ 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49《河东道十·代州》，中华书局，2007年，第1027页。

⑥ 《周书》卷19《杨忠传》，中华书局，1971年，第318页。

⑦ 《隋书》卷63《杨义臣传》，中华书局，1973年，第1499—1500页。

⑧ 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179《州郡九》，第4741页。

⑨ 《新唐书》卷39《地理志》，中华书局，1975年，第1006页。

⑩ 《新唐书》卷171《刘沔传》，第5194页。

⑪ 《旧唐书》卷19《僖宗本纪》，中华书局，1975年，第705页。

⑫ 参见《新唐书》卷39《地理志》，第1005页。

⑬ 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42《河东道三·宪州》，第892页。

⑭ 参见《宋史》卷86《地理志》，中华书局，1977年，第2133页。

⑮ 参见《宋史》卷272《杨业传》，第9303页。

建设, 洪武六年(1373)“诏山西都卫于雁门关、太和岭并武、朔诸山谷间, 凡七十三隘, 俱设戍兵”。<sup>①</sup> 作为抵御鞑靼、瓦剌的前线, “雁门关”与其周边地域业已形成了一套完备的防御体系。

隋唐以来, “雁门”一地见载于史的关隘多为“东陉”“西陉”。战国秦汉时期的“句注塞”, 北魏明元帝所至之“雁门关”, 北朝隋唐时期的“陉岭之隘”, 以史念海、靳生禾为代表的前辈学者认为即文献中的“西陉”, 位于今代县雁门关镇白草口村<sup>②</sup>。学界对此无异议。故而, 不少学者认为隋唐时期的“东陉(关)”为明代以降“雁门关”前身。如光绪《山西通志》载: “东陉、西陉, 皆因句注陉而名。古雁门关为太和岭, 在今关之西, 即西陉也。则东陉当是今关, 若滹沱南山, 则非句注矣。”<sup>③</sup> 靳生禾、谢鸿喜亦以东陉关为今雁门关。<sup>④</sup> 李新峰认为, 句注山中自古有东、西两陉, 偏西的一条道路即为西陉, 偏东的是东陉, 在今雁门关道路。<sup>⑤</sup> 《山西历史地图集》中于明代以降的雁门关处标示为唐代东陉关。<sup>⑥</sup> 《雁门关志》载雁门关至明代形成雁门古关与雁门新关的“双关双城”体系, 雁门新关即为东陉关, 关城为明代所筑。<sup>⑦</sup> 以上诸家观点或可称为“雁门关东陉说”。

此说业已受到学界辩驳。史念海认为, 东陉与明代以降的雁门关不在一地, 据光绪《代州志》相关记载而推测在今代县东北的胡峪一带。<sup>⑧</sup> 严耕望则大致认同《通典》对东陉关方位的记述, “(代)州南二十里有东陉关”, 不过, 却认为其“似亦在此道(太原北出雁门关西北通单于府及河上三城道)上”<sup>⑨</sup>, 将东陉视为设置于“逾句注”而连通南北的大道上的关隘。谭其骧则将东陉关置于代县东南约15里处。<sup>⑩</sup> 实际上, 无论是“雁门关东陉说”, 还是史念海、严耕望对东陉所在或东陉交通意义的判断, 都存在值得商榷之处, 而谭其骧对于唐“东陉关”的标注则需要更多的论据加以支撑。

## 二 “山形勾转”与东陉所在

“东陉(关)”得名与“陉岭”关系密切, 而“陉岭”又是句注山在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称谓。从今日各版地形图来看, 句注山乃一东西绵延的山脉, 其东接恒山山脉东段、北段和太行山, 西连管涔山、云中山, 是大同盆地与忻定盆地的地理分界线、桑干河与滹沱河的分水岭。

上述地理观念有着较为久远的历史源流。西汉前期的汉匈战争中, 可见匈奴“逾句注”、汉军“屯句注”等记载, 战争双方南北纵向的军事行动, 很容易让人将“句注(山)”视为东西

① 参见《明史》卷91《兵志三》, 中华书局, 1974年, 第2235页。

② 参见史念海:《论雁门关》,《河山集》(第四集),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1年, 第402—426页; 靳生禾、谢鸿喜:《关于雁门关年龄、遗址的考证和考察》,《山西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

③ 曾国荃、张煦等修, 王轩、杨笃等纂: 光绪《山西通志》卷35, 光绪十八年刻本。

④ 参见靳生禾、谢鸿喜:《杨家将古战场考察报告》,《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

⑤ 参见李新峰:《雁门关“东陉”考》, 王天有、徐凯主编:《纪念许大龄教授诞辰八十五周年学术论文集》,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 第535—543页。

⑥ 参见山西省地图集编纂委员会:《山西历史地图集》, 中国地图出版社, 2000年, 第392页。

⑦ 参见王凤岗主编:《雁门关志》, 三晋出版社, 2010年, 第5页。

⑧ 参见史念海:《论雁门关》,《河山集》(第四集), 第419页; 光绪《代州志》卷3《地理志》, “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 凤凰出版社, 2005年, 第11册, 第300页。

⑨ 参见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5卷《河东北区》,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年, 第1348页。

⑩ 参见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5册《隋·唐·五代十国时期》“唐·河东道”图, 第46—47页。

横向走势的山脉。而中原政权较早地依托句注山险修筑的关隘所在，无疑加深了世人的这种认识。东汉应劭注《汉书·文帝纪》之句为：“山险名也，在雁门阴馆。”<sup>①</sup> 位于汉代雁门郡阴馆县境内的“山险”，很可能便是《吕氏春秋·有始》所言的“句注塞”，同时也是汉朝为抵御匈奴南下而“屯句注”之处。北朝隋唐时期，“西陁”更为频繁地见诸史乘，由于它是在战国秦汉时期“句注”基础上发展而来，故而许多文献便将句注山与西陁山等同起来。所不同的是，由于上古、中古时代的雁门郡一在山北、一在山南，定位句注（西陁）所在的基点，发生了由山北的“阴馆县”转为山南的“雁门县”的改变。例如，《元和郡县图志》“代州”“雁门县”条记载：“句注山，一名西陁山，在县西北三十里。”<sup>②</sup> 《太平寰宇记》所载句注山方位同此<sup>③</sup>，《舆地广记》“代州”“雁门县”条有言，“有句注山，汉击匈奴于此，一名西陁”<sup>④</sup>。借“西陁”来定位“句注山”的做法，自然便将后者厘定在今滹沱河以北域内。《大明一统志》与《大清一统志》皆记“句注山在（代）州（西）北”<sup>⑤</sup>。

作为历史时期北部边疆、塞外草原与中原内地沟通联系的重要节点，句注山在许多传世的地理志书中均有记载，在《中国历史地图集》相关各册目中，其不同时代的具体位置虽稍有变动，但却都标注在滹沱河以北。史念海论及句注山时，亦多次视之为“横贯东西”“绵亘东西”的“南北巨防”。<sup>⑥</sup> 可见，句注乃一东西绵延、分隔内外的山脉的观念可谓深入古今之人心，山脉得“句注”之名的本义反倒为多数人所忽视。

《说文解字》成书于东汉和帝至安帝时代，正值“句注”一称广为使用之时。该书释“句”为“曲也”，段玉裁注：“凡曲折之物，侈为倨，敛为句。……凡地名有句字者，皆谓山川纡曲”；释“注”为“灌也”。<sup>⑦</sup> 以“句”名山，山当有“纡曲”之大貌，峰回急转呈句敛之势；以“注”名山，应表明有水灌入或流出其中。可见，若将“句注”视为一东西向绵延的山脉，不能体现出山势“纡曲”，且有水出其中的得名依据。对于句注山形势与地望的考辨，则应具有更加宏观的视阈。如《读史方輿纪要》引五代李璋《河东记》曰：“句注以山形勾转水势注流而名。”<sup>⑧</sup> 以“山形勾转”表明“句注”山势并非呈东西直线走向，应有所“纡曲”。“山形勾转水势注流”则精炼概括“句注”周边地域山水形势以释其得名。《大清一统志》云“大抵（代）州境诸山得名者，皆句注之支脉耳”<sup>⑨</sup>，则言明句注的研究视阈可放在整个“代州”境内，而非局限于滹沱河以北的山脉。清人阎若璩云：“曾有人登雁门，逾夏屋，极目于句注、广武之间，而知陁山形如人字。”<sup>⑩</sup> 阎若璩记述的他人登峰“极目”，所见“句注、广武之间”“陁山形如人字”的状貌，正可说明代州域内滹沱河南北之山脉应视为一体。南北两脉于今繁峙以东勾连而呈

① 《汉书》卷4《文帝纪》，第131页。

② 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14《河东道三·代州》，中华书局，1983年，第402页。

③ 参见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49《河东道十·代州》，第1027页。

④ 欧阳忞撰，李勇先、王小红校注：《舆地广记》卷18《河东路上》，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21页。

⑤ 参见李贤等撰：《大明一统志》卷19《太原府》，三秦出版社，1990年影印版，第289页；和珅等撰：乾隆《大清一统志》卷114《代州》，“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76册，第317页。

⑥ 参见史念海：《论雁门关》，《河山集》（第四集），第402—426页。

⑦ 许慎撰，段玉裁注，许惟贤整理：《说文解字注》卷3上《句部》，第157页；卷11上《水部》，第965页。

⑧ 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輿纪要》卷39《山西一》，中华书局，2005年，第1786页。

⑨ 和珅等撰：乾隆《大清一统志》卷114《代州》，“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76册，第317页。

⑩ 阎若璩撰，黄怀信等校点：《尚书古文疏证》卷6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12页。

“纡曲”之势，即所谓“人字”之头，滹沱河源出其中而西流，整体上恰好体现出“山形勾转水势注流”的山川大势。上述几则史料显然未能引起历代治“句注”“雁门关”研究者的重视。

在明确“句注”得名缘由与其周边山水形势的基础上，再言“雁门关东陞说”。视东陞关为明代以降雁门关的前身，很可能忽视了“句注（陞岭）”在滹沱河南北两侧“纡曲”勾连的走势这一自然地理状貌，而仅仅将“句注（陞岭）”视为滹沱河以北的山脉。

基于上述判断，杜佑所谓“（雁门）郡南三十里有东陞关”反而被视为误记。杜佑乃当朝人言当朝事，若《通典》相关记载于流传过程中未出现错误，则不应轻易怀疑其可信性。“东陞（关）”与“西陞（关）”相比，位置确实偏南，不过这或许是以东西流向的滹沱河为地理参照相比，然而“东陞”“西陞”之得名与并称，显然是以名为“陞岭（句注）”的山脉为基础。杜佑将“东陞关”所在记于“郡南三十里”，正是从自然地理方面正确理解了“句注（陞岭）”得名之本义，将滹沱河南北两侧的山脉视为“纡曲”勾连之一体，言其为“东陞”正与“山形勾转”之形势相符，虽处“郡南三十里”，实亦位于郡治西北的“西陞”以东。据《水经注》佚文所言，在雁门郡治的北面当为句注山，南面有东陞关，即《吕氏春秋》所言天下“九塞”之一。“山形勾转水势注流”的自然地理情况，说明滹沱河南北之山脉均为“句注”，东陞亦位于其上。郡治北面之西陞、南面之东陞，是能合起来以当九塞之一的。五代李璋《河东记》所言，清人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所引，很可能都是从实地考察的所得中来与前人记载相考证的体现。

上述诸家多从相对宏观的视阈对“东陞（关）”所在作出判断，关于其具体地望，学界存在几种不同看法。光绪《代州志》列有“东陞关”的三处坐落方位。《地理志》一说“胡峪山在州东北四十五里，有东津口，或以为即东陞关也”；又以“舜山在州东南十五里……亦曰舜井山，下临凤游峪，峪即东陞关也”。《建置志》则言“东津谷或云即东陞关，然在北楼堡界，去州约八十里，准其地望，似非”。<sup>①</sup> 光绪《代州志》虽详载“东津口”“东津谷”<sup>②</sup>之方位，似乎因之地处滹沱河以北，而并不认同其乃古代的“东陞关”。不过，史念海则以此为据，将东陞考订在今代县东北20余公里处的“胡峪山”“东津口”。<sup>③</sup> 这或许是对“句注（陞岭）”的状貌有所误解而致。其实，位于滹沱河以南的“舜井山”“凤游峪”，正与“句注”一带的宏观山川形势对应，正确指出“东陞关”的具体地望，《代州志》便明言“峪即东陞关也”。

总之，明代以降雁门关位于滹沱河以北的“句注山（陞岭）”上，而唐代“东陞关”位于河南“句注山（陞岭）”上的记载，与“山形勾转水势注流”的宏观自然地理形势相符。轻易否定《通典》所载，将“东陞关”与“雁门关”置于一侧山脉上，无论是“雁门关东陞说”还是“东陞关”位于胡峪的判断，都应予以重新审视。综上所述，东陞关很可能位于今代县东南约7.5公里处的峪口乡一带。

### 三 安史之乱战局走向与“开东陞”

“东陞关”较早且明确见于文献，多与安史之乱时唐将郭子仪的军事举动有关。《旧唐书·郭子仪传》记载：

① 参见光绪《代州志》卷3《地理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第11册，第300、301、325页。

② 地处“北楼堡”界的“东津谷”在明一代是为“广武”“北楼”两地分界，亦当在州东北。[杨时宁：《宣大山西三镇图说》，薄音湖、王雄编辑点校：《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2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42、344页。]

③ 参见史念海：《论雁门关》，《河山集》（第四集），第419页。

(天宝)十四载,安禄山反。十一月,以子仪为卫尉卿,兼灵武郡太守,充朔方节度使,诏子仪以本军东讨。遂举兵出单于府,收静边军,斩贼将周万顷,传首阙下。禄山遣大同军使高秀岩寇河曲,子仪击败之,进收云中马邑,开东陁,以功加御史大夫。<sup>①</sup>

《新唐书·郭子仪传》所记大致相同:

(天宝)十四载,安禄山反,诏子仪为卫尉卿、灵武郡太守,充朔方节度使,率本军东讨。子仪收静边军,斩贼将周万顷,击高秀岩河曲,败之,遂收云中、马邑,开东陁。<sup>②</sup>

《资治通鉴》的记载比两唐书更为详细:

(天宝十四载十二月)安禄山大同军使高秀岩寇振武军,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击败之,子仪乘胜拔静边军。大同兵马使薛忠义寇静边军,子仪使左兵马使李光弼、右兵马使高濬、左武锋使仆固怀恩、右武锋使浑释之等逆击,大破之,坑其骑七千。进围云中,使别将公孙琼岩将二千骑击马邑,拔之,开东陁关。<sup>③</sup>

探讨郭子仪“开东陁”的背景、原因和意义,有助于从军事地理、交通地理方面判断“东陁关”所在。

安禄山欲谋乱之时,对于可联通河北、河东两地对唐军进行战略钳制的军事要地已有所控制。《新唐书·王忠嗣传》载:“又安禄山城雄武,扼飞狐塞,谋乱。”<sup>④</sup>在安禄山控制飞狐塞后,位于蔚州的横野军亦被安禄山收至麾下参与了叛乱,直到至德二年(757)李光弼太原守卫战后,横野军才复归于唐。<sup>⑤</sup>安禄山后又以其将高秀岩守大同,使安忠志以精兵守土门,“又使其将李钦凑将兵数千人守井陘口,以备西来诸军”,胡三省注曰“西来诸军,谓河东路兵东出井陘口者”。<sup>⑥</sup>身为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率领的军队中就有河东兵。<sup>⑦</sup>那么其所要防范的能够东出井陘,联通河东、河北两地而断其后路者,应当是在平叛安史之乱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朔方军。纵观郭子仪开东陁之时,当时河东、河北地区的战局,高秀岩势力被唐军控制在代州以北,常山太守颜杲卿以计杀李钦凑“悉散井陘之众”<sup>⑧</sup>,联通河北、河东的重要通道井陘重归唐军控制之下。此时需要做的就是彻底切断叛军可能由河北进入河东的道路,即由幽州、妫州、蔚州等地循飞狐道、莎泉道、灵丘道,与由易州、定州、恒州等地沿滹水循莎泉道、灵丘道,经“瓶形寨”<sup>⑨</sup>往滹沱河上游谷道,最终通往代州的道路。

唐代,位于代州东北方向的蔚州,其政治中心置于灵丘(今山西灵丘)。相较于战国秦汉时

① 《旧唐书》卷120《郭子仪传》,第3449页。

② 《新唐书》卷137《郭子仪传》,第4599页。

③ 《资治通鉴》卷217《唐纪三十三》,“天宝十四年十二月”条,中华书局,1956年,第6944页。

④ 《新唐书》卷133《王忠嗣传》,第4554页。

⑤ 参见《旧唐书》卷110《李光弼传》,第3305页。

⑥ 参见《资治通鉴》卷217《唐纪三十三》,“天宝十四年十一月”条,第6936页。

⑦ 参见姚汝能撰,曾贻芬点校:《安禄山事迹》,中华书局,2006年,第22页。

⑧ 参见《资治通鉴》卷217《唐纪三十三》,“天宝十四年十二月”条,第6945页。

⑨ 瓶形寨之名于唐世无考,其名多见于宋,或许在唐一世,此地并未有关塞的设置。

期以壶流河盆地的代县（今河北蔚县）为区域政治中心的情况，唐代政治中心向位于山地中的灵丘盆地转移，或许说明当时最高统治层对于穿切恒岳、太行山区，联通河东、河北交通线的高度重视。而此举与北魏平城时代，对于两地交通的大力开发之间的关系，同样值得关注。北朝时期对经由滹沱河上游谷道连接代州及其东北向蔚州、妫州、幽州等地的道路已有所利用。《魏书·张敖提传》载：“时京畿盗魁自称豹子、虎子，并善弓马，遂领逃连及诸畜牧者，各为部帅，于灵丘、雁门间聚为劫害。”<sup>①</sup>足以见得其时两地间商旅往来交通之繁忙。北周保定三年（563），周人议与突厥共伐齐，攻晋阳。“齐人守陉岭之隘，忠纵奇兵奋击，大破之。又留杨纂屯灵丘为后拒。”<sup>②</sup>杨忠以奇兵致胜后，未言布防于直下晋阳之路，而是在东北方向的灵丘留兵屯驻，其所阻防的兵力或正是可沿飞狐道等路东来的齐兵。唐代此路仍是十分重要的道路。建中四年（783），神策河北行营节度使李晟“引兵出飞狐道，昼夜兼行，至代州”<sup>③</sup>。《元和郡县图志》载：“代州（今代县）东北至蔚州（今灵丘）四百里。”<sup>④</sup>故李晟昼夜兼行即可由飞狐至代。由易州、定州、恒州循滹沱河上游谷道而至代州方向的道路，虽已如沈括所言“今此路已不通”，然其所勾勒的由“飞狐路……北出倒马关度虜界……入瓶形、梅回两寨之间，至代州”<sup>⑤</sup>一线，其道路通行或并不晚于北朝隋唐之时。至明时，由倒马关一地“有大道往西北，直抵恒山之麓……乃大同入倒马、紫荆大道也”。<sup>⑥</sup>由倒马关西北所去之路，明代已复为通行大道。及至清代，代州（今代县）平刑关已成为“路通灵邱县，西北连浑源州大寨口，南接直隶正定府阜平县”的扼要之地。<sup>⑦</sup>灵丘、雁门两地连接起了穿切太行山区的重要交通路线。雁门一地自古有西陉阻断北犯之敌，以控守南北交通要道。设置于滹沱河南岸的东陉，则可对于经灵丘进入太行山西麓的东来之敌，扼阻在河谷道上游一线，其于河谷道东向交通的作用亦不容忽视。严耕望对于东陉军事交通意义的判断，或可重新予以考量。

安禄山叛乱之初，河北灵丘已归于其控制之下，在河东雁门阻断可能由东而来的叛军是唐军接下来重要的军事部署。郭子仪“开东陉关”，《通鉴》胡注：“雁门县有东陉关、西陉关。时河东、太原闭关以拒秀岩，子仪既破秀岩，始开关。杜佑曰：‘代州，雁门郡；郡南三十里有东陉关，甚险固。’西陉山，即句注山。”<sup>⑧</sup>胡氏虽有言“闭关”“开关”，然二者并不矛盾，唯所指不同而已。“闭关以拒秀岩”，当指滹沱河北以西陉为主要代表的南北向隘口；“始开关”之东陉，如前所言，乃是为率主力下井陉解除后顾之忧，阻防东方来犯之敌，故“开关”于河南，可与河北之西陉共同扼住滹沱河上游一线河谷道交通，故注意力并非是在陉北。再则史书言及东陉皆为“开东陉”而非“塞（闭）东陉”，唐军若于河北之陉岭“开东陉”，岂非为高秀岩潜在的南下提供另一条选择路径？不仅不会强化陉岭的防守，反而会有分兵守陉之不利。当然，唐军利用西陉大路之外，河北陉岭上其他隘口“崎岖难行”之地利，适当派兵把守的可能性也不应轻易排除。当时西陉为唐军控制，郭子仪大军由此南下代州、太原顺理成章，何必大费周章地在

① 《魏书》卷89《张敖提传》，第1922页。

② 《周书》卷19《杨忠传》，第318页。

③ 《资治通鉴》卷229《唐纪四十五》，“建中四年十一月”条，第7370页。

④ 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14《河东道三·代州》，第402页。

⑤ 沈括：《梦溪笔谈》卷24《杂志一》，岳麓书社，1998年，第204页。

⑥ 徐弘祖著，褚绍唐、吴应寿整理：《徐霞客游记》卷1下《游恒山日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88页。

⑦ 参见《大清一统志》卷114《代州》，“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76册，第323页。

⑧ 《资治通鉴》卷217《唐纪三十三》，“天宝十四年十二月”条，第6944页。



河北陔岭上“开东陔”以资敌，以弱己？于河南陔岭上“开关”，既可配合河北一线布防，又为大军南下并陔提供了另一条道路。光绪《代州志》即言：“子仪引军东下并陔即由此道。”<sup>①</sup> 隔滹沱河而南北遥遥相对的东、西二陔，恰可对沿河源由东北、东南两方向，自东而西来犯之敌形成在河谷道上的夹攻之势。东陔设置，目的不在防北，而在防东。是以胡三省有言东陔关、西陔关，为太原四塞之一。<sup>②</sup> 胡氏以东陔关与西陔关两关并举，可知东陔之作用当与西陔同。西陔北控大同，东陔东阻飞狐、倒马，两关联防则可断绝叛军由河北进入河东之路，唐军由河东经并陔入河北亦可无后顾之忧。至德元载（756），李光弼、郭子仪先后引兵自并陔出，对河北的叛军势力予以重创。五月，郭子仪、李光弼与史思明战于嘉山，嘉山一役后河北十余郡皆杀贼将降唐。安禄山亦言：“今守潼关，数月不能进，北路已绝，诸军四合，吾所有者止汴、郑数州而已，万全何在？”<sup>③</sup> 自此河北十三郡皆归唐廷。

西陔与东陔，或可视为唐军利用“山形勾转”之势，在滹沱河南北两侧山脉上各设置的屯兵驻防隘口。两个关口相互配合，对于利用“水势注流”的滹沱河谷道而西向来犯之敌，形成战略钳制，进而确保河东安全。唐代宗大历十三年（778），“回纥袭振武，攻东陔，入寇太原”<sup>④</sup>。回纥此次南下寇掠仅在安史乱后数年，“甚险固”的东陔竟被攻破。这或许是因为唐廷未能对东陔有足够重视而致其防御能力有所下降，回纥故以此为突破口入寇太原。可见西陔、东陔两关联防，才可构筑起句注天险以保内地，若一关被破，则河东危矣。

## 余 论

雁门关作为中国历史上的名关，与其所处句注山的重要交通战略地位密切相关。“雁门”“句注”皆于战国秦汉时期显著于世，二者所指虽非一地，然其于北方边疆地带的的作用皆不容忽视。魏晋之时，句注山以“陔岭”之名成为中原政权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分界线。北朝隋唐时，“雁门关”之名始现，然“句注”“陔岭”之上的关隘多被称为“西陔（关）”“东陔（关）”。“西陔（关）”为自古匈奴入寇之地，其地望学界无有质疑，然东陔所处却多有分歧。唐人杜佑以为，东陔关位于雁门郡南三十里，或可称为“东陔杜佑说”。今人则多以东陔关应地处滹沱河之北，而有“雁门关东陔说”“东陔胡峪说”；《中国历史地图集》却承续了“东陔杜佑说”。句注山地跨滹沱河南北两岸，正合五代李璋所言“山形勾转水势注流”的山川形势。“东陔”虽处郡南，确是位于“陔岭”之上无疑，与光绪《代州志》所载“凤游峪”（位于今代县峪口乡）地望大致相同。唐将郭子仪平定安史之乱时“开东陔关”，东陔的设置目的区别于西陔的北向抵御，而偏重于东向阻隔。西陔、东陔两关联防，在滹沱河上游一线所形成的战略钳制，进可保唐廷由并陔等路东出参战河北，退可保守河东、太原。总之，重新考量句注的山川形势，对于考察东陔之所在及其军事交通意义都提供了新的视角。东陔虽不同于自古为“北边”重塞的西陔，然其可与西陔合当“九塞之一”，其重要作用亦不容忽视，应引起学界足够关注。

（作者单位：渤海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本文责编：周 全 宿万涛

① 光绪《代州志》卷3《地理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第11册，第301页。

② 参见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輿纪要》卷40《山西二》，第1806页。

③ 《资治通鉴》卷218《唐纪三十四》，“至德元年五月”条，第6965页。

④ 《新唐书》卷217《回鹘传》，第6121页。